

陈谦平 主编

中华民国史 新论

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陈谦平 主编

中华民国史 新论

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国史新论·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陈谦平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8
ISBN 7-108-01996-5

I. 中… II. 陈…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民国 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民国 ③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④中国-近代史-研究-民国 IV. 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910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 数	294 千字
印 数	0,001 - 2,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张宪文教授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南京学派”

陈红民 陈谦平 张 生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成长壮大。诚如中国历史学会会长金冲及教授在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2000 年 9 月，南京）所言，民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界发展最迅速、成果最丰硕的领域。

南京曾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图书资料、历史遗迹。南京地区（包括南京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一大批学者以地利之便，最早涉猎中华民国史学术研究的领域，取得了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与贡献，他们是民国史研究的一支重要生力军。2002 年秋天，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能士教授在学术演讲中明确提出，在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有一个“南京学派”。这是对南京地区民国史研究学者多年辛勤努力的

肯定与褒奖。

“南京学派”是一个新概念，内涵与外延值得认真探讨。“南京学派”在构成上不仅包括南京地区学术研究机构学者，也应包括在南京受到过民国史研究专业启蒙与训练的一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学者。“南京学派”在治史上有五个鲜明的特色：其一，勇开风气之先。“南京学派”是大陆地区最早从事中华民国史资料整理开发与学术研究的，在大到民国史研究的体系与对象、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评价、抗日战争研究等重大问题，小到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研究与史料考订等方面，都勇于开拓探索，走在了学术研究的最前列，填补了一个个的空白。其二，治史严谨。民国史研究很热门，也很敏感，一度成为“显学”，但“南京学派”不哗众取宠，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其三，史料扎实。“南京学派”重视史料，尤其是利用档案资料，使研究成果言之有据，基础扎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更出版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与学术界分享资源。其四，视野开阔。“南京学派”不仅重视政治史、经济史，也注重文化史、社会史等，其研究成果涉及民国时期的每个时段与每个方面。其五，兼收并蓄。“南京学派”既注意吸收人文社会科学其他研究领域的新理论与方法，也注意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互动，积极组织和参与海内外的各种学术交流。其六，团结协作。“南京学派”摆脱了家庭手工作坊式的孤立研究，针对学术上的重大问题，提倡进行集团式合作研究，或联合举行研讨会，或共同出版著作，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研究成果。

民国史研究“南京学派”的出现，是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的结果。在学术史上，任何一个学派的兴起，都需要一批成果卓

著的学者，也必然有其代表性的人物。张宪文教授对“南京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是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张宪文教授1934年生于山东泰安。1954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他同时在多种学术团体中担任职务，如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南京历史学会会长、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长等。

张教授是最早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他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包括：

一、独立完成或主编了《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上、下）、《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等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其中《中华民国史纲》最早构架了民国史研究的体系，纠正了当时许多“左”的观念与认识，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首次全面论述了正面战场的作用，给予其合理的历史定位。《蒋介石全传》对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蒋介石的活动与思想给予了全面的叙述与分析。《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运用丰富的档案史料，全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提出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科学概念。《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共计450万字，是目前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全面的大型辞书，被誉为是民国时期历史的“百科全书”。张宪文教授以“新思路、新观点、新体系”主持编纂的一部大型《中华民国史》（200万字）即将于2003年底出版，相信该著作的

出版，将是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项丰硕成果。

二、创立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于1984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内设立了高校系统的第一个中华民国史研究室。1993年，经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倡议，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海内外五十多位民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受聘担任客座教授。研究中心出版《民国研究》，以中、英文发表海内外学者的研究论文，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在内的多项研究课题；组织了数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海内外有着良好的学术声誉，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著名汉学家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称赞张宪文先生“使得南京大学成为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中心”。^①

三、推动学术交流。张宪文教授是一位有着国际影响的学者，多次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及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访问讲学，出席学术会议。同时，他接待过大量的海外同行，辅导海外的访问学者与留学生，积极促进海内外学者间的合作与交流。在他的联系和推动下，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伊利诺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庆应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澳大利亚拉乔比大学等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及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① [美] 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文版序言，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出版。

四、培养民国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张宪文教授是最早招收中华民国史研究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与博士后的导师之一，多年来已培养了一大批民国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其中有不少外国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不少学生已经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术骨干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有的学生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宪文教授有着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与亲和力。他胸襟开阔，无门户之见，所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与重要著作，有不少是联合“南京学派”的学者们共同完成的，而《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更是联合全国民国史学界共同努力十多年的成果。

适值张宪文教授七十华诞，曾受业于他门下，亲聆教诲的中青年学者纷纷提供论文，为恩师祝寿。一方面彰显老师的教诲与功德，一方面显示民国史研究“南京学派”的实力。现将论文结集为《中华民国史新论》，依主题编为“政治·中外关系·人物”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两卷。学生是老师的一面镜子，这些论文深受张宪文教授治学方法的影响。论文在整体上也充分显示了“南京学派”勇于探索、治史严谨、史料扎实、视野开阔、兼收并蓄的治史特点。

目 录

张宪文教授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

“南京学派”.....陈红民 陈谦平 张 生 I

◎ 政治篇

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创新中的扭曲与失败.....陶鹤山 3

论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度.....傅光中 19

论 1928—1937 年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发展特点

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钟 声 34

1940—1945 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基础

整合绩效之考察.....田 玄 48

地方军事强人与近代化

——20 世纪 30 年代广西行政变革之研究.....李继锋 63

《独立评论》与七七事变前北方学人的抗日主张.....武 菁 82

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述略.....洪小夏 98

国民政府战时工商业团体管制述论.....	姚群民	119
论抗战时期中共对华东日伪关系的离间和利用.....	张生	131
日伪时期江苏各地“维持会”研究.....	潘敏	147

◎ 中外关系篇

“学人外交”:民国外交官人事变动的一个分析.....	岳谦厚	165
山东问题与收回国权外交.....	栋近美雪	179
北伐时期日本对华外交:从币原到田中.....	宋开友	191
1937—1945:日伪与上海“第三国”势力.....	李峻	205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	张连红	221
战后东北日本开拓民逃难及滞留情况初探.....	雷国山	237
从中日两国现代化考察中日友好关系.....	丸尾达	253
德国与九一八事变.....	陈仁霞	266
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	江沛	283
抗日战争前期的中英关系.....	邱霖	299
论“紫石英”号事件.....	陈谦平	309

◎ 人物篇

孙中山联德活动述略.....	纪乃旺	331
“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	郭红娟	341
论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丁文江.....	谷小水	354
胡汉民的人际网络(1932—1936年)		
——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中心的研究.....	陈红民	371
汪精卫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1932—1935年).....	谢晓鹏	389

◎ 政治篇

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 创新中的扭曲与失败

陶鹤山

毋庸置疑，在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市民群体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同时又是近代制度创新的主体和领导责任的承担者。市民群体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这是其走在时代前列，并领导和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标志。但在市民群体身上，我们也应当看到还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和缺陷。议会民主政治是市民群体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一手建立起来的，也是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的。议会是他们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和场所，但我们看到，地方议会政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不十分理想。随着市民群体力量的增长，其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但它还没有能力通过发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和巩固一个新的政权，并完成现代制度的构建，从而导致其在近代制度创新中产生扭曲和最终的失败。

中国近代的制度创新是由制度供给不足和短缺而造成的制度危机

引发的。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中坚力量是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一批绅商、新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官僚。他们从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基础出发来参与这一历史性的创新工作。制度创新的扭曲和失败无疑与市民群体自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市民群体身上所具有的不纯粹性、分散性、保守性和妥协性、依附性等特征，在制度创新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市民群体在创新过程中虽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但他们的创新能力显然还不够。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由于市民群体处于分裂状态，团队意识和阶层意识都较弱，有的市民作为个体积极参与，但缺乏作为整体的行动和效果。而且，许多市民所具有的很强的功利性目的也产生了较大的局限性。他们不是把议会作为本阶级和阶层的代言机关，而是作为争权夺利、进身官僚仕途的阶梯，这不能不使地方议会政治发生变质。

一、对西方民主的误读

中国近代制度创新的扭曲和失败与市民群体对民主的误读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近代介绍西方思想的过程中，误读的成分很多，这就需要我们语言和其他象征符号入手，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意识发展的历程。通过解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意识错误”的过程，中国人在吸取西方思想时，其原有的意识与新意识之间存在着一个激烈的冲突和分裂的沟渠。

近代市民群体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误读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 (1) 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理解存在偏差，主要接受的是理想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
 - (2) 对议会的功能结构存在误解。
 - (3) 对议会的操作及其程序存在误解。
- 在清末民初，民主的思想和理论经过一

大批激进知识分子的引入和传播，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有很多人明确意识到中国也必须实行民主，尤其是在民国建立之后，绝大部分史学家都强调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仅仅止于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或者说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思想和理论以及观念有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有没有给人们带来实际的民主实践的指导，以及有没有提高人们实际参政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在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某些缺陷和认识上的误区。从根本上来说，它更多的只是给人们带来了民主的理想和观念，而且是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民主理念，至于中国应当如何实施民主的问题，在当时很少有人讨论，即解决的问题是要不要民主，而不是民主应当如何运作，以致在真正实行民主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民主，而是把它看做传统地方自治游戏的翻版，这就是近代民主思想陷入悲哀的缘由之一。

这种误读并不是仅仅在民主问题上独有的现象，应当说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发展过程中很普遍。在中国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这种误读同样存在，如在近代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作家自己创作的作品中，一种“真心地模仿”的观点有一定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模仿到外国文学作品的全部，而仅仅是模仿了其中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从主观上看，一是由于接受者对原著或外国作家的见解并不十分把握，望文生义。匆忙引进，自圆其说一番后，便大张旗鼓地实行起来；二是由于专取原著者中附和自己意愿的一部分，断章取义，甚至与原著者的意思相反也不顾。从客观上看，“首先遇到的是语言上的隔

①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阅，接受者尽管要努力理解原义，语言上的隔阂难免会造成误差，而且语言本身的历史演变造成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也使得语言间难以通融。”^①

近代市民群体只是注意到要利用民主的形式，但在权力资源的配置和组合上却无法做到自主地完成这个转型。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一样，在形式和实质内容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让我们看到市民群体在制度创新中的行为能力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因此近代市民群体的制度创新本质上是形式上的创新，而不是实质内容上的创新。这一点从清末民初各省咨议局和省议会组成情况中可以看出。咨议局的议员基本上都有旧功名，省议会会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旧功名的人，真正属于市民群体中的骨干分子常常并没有参与其中。

从大量地方志的编撰来看，很多编撰者都把地方议会的选举以及议员放入“自治”一栏，或列在传统的“选举”项目中，本身就说明了在认识上（或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并没有把地方议会制度放在一个应有的高度上，而是把它纳入到传统的地方绅士的自治权的延伸之中。这就难怪近代制度创新中，地方议会政治制度会产生扭曲和失范。因为人们并没有把它们看做两类不同性质的，也是不同层次的制度创新。这是清末民初市民群体在创新中认识上的又一个重要误区。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是清政府对地方绅权在社会中的地位给予的再一次确认，但地方议会的产生应当是立于这个根基之上，是真正创立现代意义上、能够代表市民群体全体意志的、独立于国家权力

^① 汤哲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第48—第5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机构之外的、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正式规范的政治组织机构。但是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民群体自身内部组织上的缺陷等原因，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这次创新机会。之所以会陷入一种对民主认识的误区，并陷入一种民主乌托邦，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接受的是西方启蒙时代的民主理念，是对自然状态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而这种理念又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主义、大“公”社会的理念相吻合。另一方面，在对民主的认识上，常常把它与中国固有的绅权自治相混淆，即这种民主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的民主，而是传统地方精英的民主，实际上还是“为民作主”。就拿议会选举来说，清末民初的议员选举并不是全民普选，更多的是在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地方精英之中进行的，如四川省咨议局选举的选民共 119530 人，仅占全省人口的 0.34%。^①但不管是有旧功名的，还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以及有资产者，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是地方议会民主制度的产物，而是把它看做绅权的地方自治产物。

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公民自治篇》中，强调变法当从地方自治入手，以立国本，“今吾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也。救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②。梁启超更是通过对古代议会制度的考证，把地方自治看做争取民权的“第一基础”，认为“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③从字面上看，康、梁等人都已有民权思想，但关

①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第 390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出版。

②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新民丛报》，第 6 号。

③ 梁启超：《问答》，《新民丛报》，第 20 号。